

Each Modernization Has Its Own Unique Way

—Study on *China Transformed: 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

Yuan He

Business School of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s & Law, Beijing
Email: 270306005@qq.com

Received: Sep. 25th, 2015; accepted: Oct. 13th, 2015; published: Oct. 16th, 2015

Copyright © 2015 by author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Abstract

China Transformed: 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 is the representative work of the California School, and it is also a magnum opus which is against Eurocentrism. This book provides a totally new idea for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towards modernization, which has great significance both on learning and reality. This paper strengthens this argument by studying on this book.

Keywords

California School, Eurocentrism, China Transformed

发展无对立，各自有特点

—读《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

何 渊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北京
Email: 270306005@qq.com

收稿日期：2015年9月25日；录用日期：2015年10月13日；发布日期：2015年10月16日

作者主要是对于中国和欧洲国家的形成路径和形成后的制度机构和意识形态进行比较，来说明中西方社会的差异；下篇是社会抗争，通过对于中国和欧洲食物骚乱、抗税运动和革命的对比，来研究中西方在过于维护社会秩序上的不同。

3.1. 经济发展

经济方面，明清时期中国的人口与资源状况与近代欧洲早期大致相同：近代早期的英国农业和明清时期的中国农业经济，都处于一个农业收成不保险，生产原料有限的世界中，二者都经历了由经济扩展与收缩组成的周期循环，在类似斯密动力的推动下，这种循环逐渐创造出更大规模的经济[3], p. 29)。但是到了 18 世纪 60 年代，英国发生了工业革命[4]，带动另外一些欧洲国家也进行了工业化，欧洲各国通过工业革命摆脱了人口与农业收成之间的局限。此时的中国处在乾隆年间，在西方发生重大变革的时候，中国还依旧继续着原有的生活方式，仍面临着人口超过资源的潜在威胁。此时，中西方的经济变化已经不同。

原始工业的动力，与造成 19 世纪欧洲工业化的一系列条件，具有很大差别。在欧洲，城市工业化与农村原始工业化是同步发生的，但在中国，农村工业延续了很长时间。因此，当我们发现了与原始工业化相类似的情况时，不应当希望在中国会有欧洲式的工业化的出现。

3.2. 政治道路

中国与欧洲的国家形成过程不同：首先，在国家形成之前，中国与欧洲的政治组织形态上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在欧洲，政治组织方式杂乱无章，同时存在众多小型政治单位，但中国是很早就形成了大一统的格局，建立了一个幅员辽阔的帝国，基本不存在欧洲式的贵族、宗教机构和政治传统。中国和欧洲的小国都通过领土扩张进行发展，出现了不同的结局：中国形成了大一统的国家，而欧洲形成了一种多国体系。

在国家形成过程中，作者分别通过对两者面临的挑战、拥有的能力、所履行的义务、国家形成后两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和强制力以及其他方面的比较，来说明两者所处环境和面临的情况的重大不同，进而论证两者之后没有也不可能形成相同的工业化的路径。具体来讲，例如，当时欧洲国家面临的挑战来自国内威胁和对外关系，国内的威胁有两点：1) 贵族取代王室的挑战以及贵族对王室权力加以严厉的限制；2) 平民动员起来反对政府；而中国面临的挑战则完全不同，国内是重建和改造一个农业帝国的挑战，外部则是要面对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欧洲通过加强武力和使军队进一步官僚制度化进行发展，而中国在政治上保持对一个农业帝国的统治，在经济上从国家获得必要的资源。在意识形态方面，欧洲的教育、学术与教会之间关系密切，独立思考的人们仍能拜托教会认可的世界观并对其进行挑战，并且把能触及农民心灵的事物交给教会；中国则努力建立一套相关的策略，以限定知识分子的教育以及国家偏好的普通民众的信仰。在中国，政府更加关心农民的福利，通过登记人口并鼓励人民告发邻人，形成亲属关系网动员精英参与运用社会控制的意识形态手段与物质福利手段维持社会，而欧洲更加重视个人，重视公民权扩大和大规模官僚机构建立时权威机构的变革，不奢望让精英发挥与国家日常工作程序相符的作用，因为贵族精英拥有争夺权力与权威的基础，欧洲也从未将农民作为物质利益控制的对象。在财政获取方面，欧洲通过战争和征税扩大财政收入，而中国更多的是节流而非开源，考虑财政改革时，通常竭力去解决赋税负担的轻重及征税的公平性问题，而非用新方法增加额外收入。

不同的政治逻辑，推动着中国和欧洲完全不同的国家形成过程。

关于制度机构，在动员资本与管理工业两方面，欧洲国家在所起的作用极小，而在中国，国家却发挥了很大的作用[5]：国家促进农业生产，调节商业性分配，鼓励移民开发边疆，促进社会繁荣。由于欧

洲的贵族精英能够抵御王室，所以他们要求政治参与权，进而发展出欧洲的政治代表制度，除此之外，王室还要戒备农村的群众抗议；而中国很早就解决了贵族要求独立于国家之外的权力问题。在欧洲，地方自治是一种参与的民主，形成“市民社会”，欧洲的中央——地方关系，必须置于一种多国体系内部加以观察；而在中国，没有所谓的“市民社会”，也未处于多国体系之中，中国对于地方秩序的关注中心是农村，国家对于地方的统治基于政府与精英双方努力的结合。从上面的对比可以看出，中国的战略产生一个农业帝国，故与欧洲经验很少有相似之处。

3.3. 社会抗争

关于食物骚乱，首先作者就指出，“如果认为歉收与因食物供给紧张而展开的斗争之间是一种简单的因果关系，这是错误的” ([3], p. 160)，并给出了大量的事例来论证这一观点。发生食物骚乱时，在中国，国家负有双重的任务：一方面是稳定地方粮价，另一方面是将粮食从低价地区转移到高价地区。而在欧洲，中央集权化过程中的英、法两国，建立了自由的粮食市场，即免除了官方干预的市场。可以看出，那些在商业上积极进取的欧洲国家的形成，与加强中央政府对一个繁荣的农业帝国的控制，二者几乎没有相似之处。然而，虽然食物骚乱在两个地区都发生了，但两者的政治经济却存在明显的不同。

在欧洲，由于国家实力的不断强大，当国家建立起征税的能力时，抗税运动逐渐减少，集体抗税从20世纪之后完全消失，但在中国，由于晚清政府的衰弱，抗税运动则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场景：抗税运动从一种孤立的、小规模冲突，转变为一种很容易与其他小规模冲突或者大规模冲突联系起来的现象。

1911年清朝灭亡，在之后的将近40年中，中国形成了一段相当长的多重政权时期，政治呈现出不稳定的态势，而虽然19世纪的法国经历了好几种政府形式：君主专制、共和国、帝制，但两国的不同在于中国缺乏国家的统一性。毛泽东等人都强调农村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当时的环境也使他们有机会能争取农村的支持。中国共产党“民主”的观念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出来的。中法都出现了帝制复辟，但两国的社会条件差别很大，中国人并没有强调“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也没有强烈要求社会正义。中国也一直没有出现议会制。中国也没有出现法国大革命中导向“公民”概念的、对法律地位重新界定的动力。

法国革命的成功和与精英分子的合作是分不开的，农民起到的是消极的作用。但在中国，农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除此之外，1870年以前法国的政治问题，集中在不同的社会利益集团在政治上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不同机构的组织、权力及责任的范围，这样的情况下，中央政府有力量去建立遍及全国的统治权，而各种利益集团通过制度化的方式向政府表达诉求。而中国的问题是不同层次政府的规模与相互关系，利益集团想要的，是避免政府干预，而不是努力在政府中“发出声音”。

4. 结束语

西方国家的全球性的政治扩张，以及起源于欧洲的资本主义制度所导致的经济变革，是推动近二百年以来世界历史发展的最强大的力量[6]。但在中国，由于原先不存在欧洲式的民族国家与资本主义，所以过去许多学者认为只有受到了欧洲影响的时候，中国才进入世界历史洪流。

然而本书的作者打破了“欧洲中心论”的观点，充分运用了比较的方法，将前瞻法和追溯法相互运用，分别从经济发展、政治道路和社会维护三个大的角度对于中国与西欧进行了全面而细致的比较，指出中国与欧洲在经济、政治、文化、制度、意识形态、社会维护等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不同[7]。一方面，打破“欧洲中心论”不仅是一种学术观点，更重要的是，打破了“欧洲中心论”中暗示出的种族歧视；另一方面，指出中西方的差异表明在不同的环境之下，两者表现出发展方式与发展特点的不同就不足为奇了。因此，在社会的各个重要的方面都存在着如此大差异的情况下，无论是用欧洲的框架来考察中国还是用

中国的框架考察欧洲，都是徒劳而没有意义的。更进一步，关于“近代化”路径的比较而言，各自的文明本来就有着不同的根基，面对“挑战”由采取了不同的解决方式，使得各自的发展有着独特的特点，因此，在此背景之下，非要指出孰优孰劣的想法也就失去了价值。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1] 周琳 (2009) 书写什么样的中国历史? ——“加州学派”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述评.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 50-58.
- [2] 瞿商 (2008) 加州学派的中国经济史研究特色与创新述评. *国外社会科学*, **6**, 103-107.
- [3] 王国斌 (2008) 转变的中国. 江苏人民出版社, 南京.
- [4] 黄敬斌 (2012) 两种“欧洲中心论”: 兼谈加州学派的历史诠释. *社会科学*, **11**, 141-147.
- [5] 李伯重 (2000) “相看两不厌”——王国斌《转变的中国: 历史变迁及欧洲经验的局限》评介. *史学理论研究*, **2**, 48-58.
- [6] 王德 (2013) 逻辑必然性缺乏的历史学纬度考量——读王国斌《转变的中国: 历史变迁及欧洲经验的局限》. *前沿*, **5**, 52-54.
- [7] 周顺 (2006) 比较视域中的“中国内发性发展”读《转变的中国: 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 *复旦政治学评论*, 348-356.